



党建引领国家治理效能实现新提升

肖小芳
于浩宇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根本保证。“十四五”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与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将党的建设融入国家治理的各领域各环节,通过强化政治引领、夯实组织根基、完善制度体系、深化自我革命,实现治理方向更准、治理末梢更活、治理运行更顺、治理根基更牢,推动国家治理效能实现系统性提升。

政治引领把准治理方向

方向涉及根本、关系全局、决定长远,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前提是方向正确。“十四五”时期,党中央通过政治引领牢牢把握治方向,以思想统一凝聚治理共识,以政治执行确保决策落地,推动国家治理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思想铸魂凝聚治理合力。“十四五”时期,党中央以党内集中教育为重要抓手,先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有效推动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更加自觉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治理共识和强大合力,为国家治理效能提升汇聚磅礴力量。

政治执行强化战略落地,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政治执行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战略规划落地见效,让发展成效惠及全体人民。政治执行力的不断提高进一步强化了“全国一盘棋”意识,推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不断健全,打赢了一场又一场抢险救灾的大仗硬仗。

组织强基激活治理末梢

基层是党联系和服务人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和“神经末梢”,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十四五”时期,党中央持续推进基层党组织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

农村基层党建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十四五”时期,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增强,有效推动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村“两委”班子结构持续优化,村党组织书记和主任“一肩挑”比例不断提高,多地通过“选、育、用”机制吸纳返乡人才、乡贤等进入村“两委”班子,不断强化乡村治理队伍专业化水平。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建设持续推进,群众参与治理和反馈的渠道更加畅通,矛盾调解、便民服务等事项高效办理,治理效率和现代化水平极大提升。

城市社区党建推动精细化治理提质增效。“十四五”时期,全国多个城市普遍建立“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四级架构,通过“党建+网格”模式将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最小单元,推动社区治理从“粗放管理”向“精细服务”有效转变。党建引领多元治理格局持续完善,有效推动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治理要素有机整合于基层治理场域,基层治理效能显著提升。

新兴领域党建补齐社会治理短板。针对新兴领域“组织覆盖难、党员管理难、治理参与难”等难题短板,着力健全“动态覆盖”机制,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深度迈进;通过强化政治引领、健全组织体系、加强关爱服务,广泛引导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行业治理,凝聚起多元共治的强大治理合力。

制度赋能规范治理运行

制度是国家治理的依据和“骨架”,党内法规的完善以及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协调,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保障。“十四五”时期,党中央持续深化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改革,推动国家治理在规范化道路上持续行进。

党内法规划定治理边界。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制度支撑。“十四五”时期,党中央出台、修订《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一批关键性党内法规,厘清和明确了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国家治理中的权责边界、行为规范,有效防止了治理中“越位、缺位、错位”问题,确保治理始终在制度框架内进行。

制度协同释放治理效能。“十四五”时期,党中央着力推动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法规衔接协调,持续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有效促进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持续提升服务效能,“一网通办”能力显著增强,全国上下不断推进不动产登记、婚姻登记、公证办理等各项业务“跨省通办”,行政效率显著提升,治理效能得到有效释放。

自我革命厚植治理根基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国家治理效能实现提升的关键所在。“十四五”时期,党中央着眼于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国家治理注入清风正气,有效凝聚起全社会治理合力。

作风建设为治理扫除“绊脚石”。“十四五”时期,党中央以“中央八项规定”为抓手,聚焦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持续深化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着力健全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有效清除“文山会海”“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等治理“绊脚石”。仅2024年,全国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0.7万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5.6万人,“重拳”纠治推动党风政风持续好转,全党全社会治理活力充分巩固,为国家治理筑牢坚固“廉洁防线”,让治理成果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反腐败斗争为治理筑牢“廉洁防线”。“十四五”时期,党中央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着力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不正之风。2024年,全国监察机关共查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76.8万件,处分62.8万人,移送检察机关2万人,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为国家治理筑牢坚固“廉洁防线”,让治理成果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作者肖小芳系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于浩宇系浙江工商大学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思想者观察

打造中国青年政策的战略韧性

■ 廉思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青年领域的矛盾往往具有“前兆性”与“放大性”,青年情绪的微小波动常常是社会风险的早期信号,青年情绪一旦扩散将迅速转化为舆论浪潮甚至政治风险。青年群体能否对国家政治制度保持稳定的信任结构、持续的认同机制和有效的沟通通道,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

进入“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处于一个高质量发展与高强度变革并行的时期。面对人口结构变化、技术迭代加速、国际局势震荡、社会心理多元等复杂局面,青年政策如何具有“战略韧性”并成为能经受风浪、持续生长的制度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理论命题与实践课题。

当代青年新特征

未来十年,中国青年将呈现出五大方面的变化。

一是人口结构的代际更替进入“深水区”。21世纪的00后全面步入社会,10后形成价值观雏形。新一代青年具有更强的个体意识和数字依赖,社会的期待与青年自我定义之间的张力更大。

二是经济结构转型带来新的职业与心理落差。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更加复杂,优绩主义导致的社会竞争加剧,部分青年容易陷入“努力无效”的心理状态。

三是数字社会的双刃效应更加突出。互联网平台一方面扩展了青年参与社会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放大了群体情绪与认知裂缝。算法治理、情绪政治与信息茧房将成为影响青年价值观变迁的新变量。

四是国际环境复杂化对青年意识形态带来外溢影响。西方话语体系通过网络文化、社交平台等渗透到青年日常生活之中,进行学理化包装后伪装性、隐蔽性更强,部分青年在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出现身份困惑。

五是青年社会结构分化明显。一方面,青年精英群体、大城市中产及以上阶层青年更加国际化、专业化;另一方面,基层青年、流动青年、新兴领域青年的生活稳定性与社会认同感不足,两者形成潜在冲突。

面对这些新趋势,我们要以战略韧性的思

维,将青年工作从“点上突破”转向“面上统筹”,从“事后干预”转向“前端治理”,从“短期项目”转向“长期机制”。

中国青年政策的战略韧性

青年工作的战略韧性,指的是面对全球变局、社会转型和代际更替,青年政策所具备的系统稳定能力、风险应对能力及持续生长能力的综合体。我们要以战略韧性的理念,打造青年政策的“长期主义”,让青年在信任中成长,在奋斗中成才,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成为最坚实、最可靠的新时代力量。

形成一个兼具预警力、缓冲力、整合力和生长力的综合系统。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发力。

从国家安全层面统筹青年政策体系建设。将青年工作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来统筹谋划,从战略高度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青年根基和持久活力。一是将青年民生纳入国家安全框架。把青年就业、教育、住房、婚恋等作为“政治安全的经济基础”,强化战略预警,委托专业机构定期发布青年民生发展指数。二是建立青年风险防范体系。依托部际联席会议和地方有关工作协调机制,构建跨部门联动机制,整合教育、劳动、人社、公安、网信等部门资源,形成全链条治理,防范从“小事件”到“大风险”的螺旋式升级。三是建立“青年情绪雷达系统”,联合网信部门和智库机构,定期发布《青年社会心理与风险指数报告》,形成早预警、快响应、可修复的治理机制。

坚持就业优先战略,破解青年发展的结构性困境。把促进青年高质量就业作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一是推进产业升级与就业结构匹配。在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持续创造高质量岗位,以产业链延伸带动就业链扩展。建立教育和产业的动态匹配机制,避免出现错配。二是完善青年就业支持体系。加大对初次就业青年、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覆盖,强化劳动权益保护。推动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拓宽非学历教育成才通道,减少对单一路径的依赖。三是拓展国际化就业空间。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为中国青年创造更多跨国就业与实习机会。提升海外职业资格互认度,拓展新兴产业的跨境发展平台。通过就业优先,既回应青年的现实关切,又从根源上化解潜在风险。

提升制度公信力和治理效能,增强青年对

制度的高度信赖。当制度公信力受损时,青年的不满很可能上升为政治对抗。对症下药,一是推出“青年议题共创平台”,将青年在就业、教育、住房、环境等领域的议题转化为政策议程,形成青年直接参与公共治理的制度通道。二是在重大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中引入“青年体验评估机制”,各类政策在实施前可主动申请进行“青年感受影响评估”,以青年视角检验政策的可感受度与可获得性。三是推出“制度信任培育工程”,以青年可感知的方式传递国家制度优势,如开设“青年看制度”系列公开课、青年走进重大工程等,让青年通过亲历增强制度认同。

推动“算法透明”与“价值显化”,构建青年友好的平台治理机制。面对算法黑箱,应推动算法进入“价值显化”的治理阶段。一是建立算法备案与信息公开制度。二是对涉及公共事务和青年舆论传播的平台,设立“算法透明度年度报告”制度,接受社会审查与第三方评估。三是建立“算法听证机制”,邀请政府部门、群团组织、青年代表、研究机构、平台企业共同评估算法效果。四是建立纠错通道,设立“算法可诉”接口,通过制度化透明,推动算法从“隐性权力”转化为“公共规则”。

促进“跨圈共识”与“社会整合”,打造包容共创的网络公共空间。为防止青年群体陷入“认同孤岛”,应通过制度化安排与公共叙事创新,推动不同圈层之间的互动、理解与协同。一是依托共青团组织体系,建立跨圈层青年议题协商机制,定期召集来自不同领域的青年代表围绕社会热点进行理性讨论并形成共识。二是支持青年跨圈层内容共创,主流媒体平台可推出跨圈层客、议题圆桌、青年纪录片等形式,营造理性表达与多元交流的舆论环境。三是可在宣传阵地中持续推出“我们这一代的共识”等主题传播项目,通过微记录、短视频、专题专栏等形式,展示不同圈层青年在共同目标中的情感连接。

中国式现代化的每一步,都需要青年作答;青年政策的每一次优化,也都关系着国家命运的延续。我们要以战略韧性的理念,打造青年政策的“长期主义”,让青年在信任中成长,在奋斗中成才,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成为最坚实、最可靠的新时代力量。

(作者系中央团校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时代中国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世界意义

■ 缪君

深化,基层组织覆盖率达98%以上。

这类系统性的机制创新,正是“共建”的生动体现——以党委领导、政府主责、妇联儿童工作委员会协调、妇联组织联动、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妇女工作机制,把“半边天”力量汇聚到国家发展的战略布局中。

以教育启智赋能,以发展成就妇女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当代中国妇女运动的时代主题。在过去十余年间,中国妇女事业发展进步,不只是数量的跃升,更是质量的跃升。

在教育领域努力消除性别差距。《新时代中国推进妇女全面发展的实践与成就》白皮书显示,我国基础教育性别差距基本消除,女童入学率稳定保持在99.9%以上,女性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在全国高等院校中,女生已占在校生总数的一半以上,研究生群体中女性占比超过50%。从乡村教师到科研工作者,从艺术创作者到社会工作者,新时代中国妇女正成为推动社会创新和文化自信的重要力量。

在经济建设中展现“她力量”。截至2024年年末,全国女性就业人数达3.2亿,占就业人口的四成以上;女性在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等领域的就业比例持续上升。女性科研人员、女企业家、新兴行业创业者数量持续增长,创新活跃度显著提升。尤其在互联网和数字经济领域,中国女性创业者已占半壁江山。

以发展促平等、以创造筑自信的理念,使

新时代中国妇女成为创新与文明的共创者,其共创的过程也是社会发展与个人奋斗的双向奔赴。

让现代化成果惠及每一位妇女

新时代中国妇女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已经并将继续体现在全体妇女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上。

共享发展成果。中国在全面脱贫攻坚中兑现了“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累计为妇女发放小额信贷和扶贫贷款超4500亿元,帮助870万名妇女创业就业。城乡妇女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保等领域的差距不断缩小,妇女共享现代化成果的基础更加稳固,在社会资源分配与经济机会中拥有更平等的参与权。

共享法治保障。新时代妇女权益保障体系持续完善,以宪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反家庭暴力法等为核心的法律体系覆盖全面,设立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性别平等评估、公益诉讼等机制。

2024年全国拐卖妇女儿童案件较2013年下降95%,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累计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逾2.6万份,妇女在婚姻、劳动、财产、人格等领域权益保护更加有力。法治的阳光照进每个家庭,也照亮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共享幸福生活。从健康保障到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我国不断加大对妇女群体的关怀力度,让女性的生活更加安心、幸福、有尊严。2024年,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妇女达6.51亿,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4.3/10万,远低于全

球平均水平。在社会公共空间中,母婴室、哺乳室等设施持续增设,“家庭友好型社会”建设深入推广。全国开始推行育儿补贴制度,各地完善育儿假、陪产假、父母育儿假等政策,托幼、养老、家政等服务供给显著增强。

为全球妇女事业发展贡献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

当今世界,性别平等仍是全球发展的共同任务。不少国家在政策、教育与社会文化上仍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的问题。中国妇女事业蓬勃发展,为全球妇女事业发展贡献中国经验与中方案。

以制度保障平等。中国以男女平等为基本国策,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妇女发展规划体系,将妇女发展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法治体系,实现了从理念倡导到制度落实的历史跃升。

以发展促进权利。以发展改善民生、以教育促进自立、以就业创造价值,中国妇女事业走出了第一条以发展实现权利、以参与促进平等的道路,成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借鉴的典范。

以合作推动共赢。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妇女事业,推动落实《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并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南南合作等平台开展教育、健康、减贫等“小而美”项目,推动设立“全球妇女能力建设中心”,始终以实际行动助力全球性别平等与妇女赋能赋权。

中国妇女事业的发展史,是一部与民族复兴和强国建设同频共振的历史。今日中国的妇女事业,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篇章,更是全球性别平等事业的生动注脚。当中国妇女事业发展迈向新的征程,我们也在逐步见证——一个更加公正、包容、温暖的社会,正在她们的努力和参与中,渐次成形。

(作者系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及欧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可对话权威”为什么能在青年中出圈

■ 薛静

近年来,当面临知识更新、学业压力、职业迷茫乃至存在性的焦虑时,不少年轻人开始向某个领域的专家寻求“解方”,以至于“遇事不问项飙”渐成风潮。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正主动走向青年文化的“现场”,在问题与思想共情中展开对话、构建理解。

从专家学者“出圈”看“可对话权威”群像

身处社会快速转型期的当代青年面临着不少矛盾:物质丰裕与“意义贫困”并存,发展机遇与“内卷”空转同在,他们习惯在数字世界中获取信息、表达自我,往往也更深入地体验和感受着项飙所言“附近的消失”带来的孤独与原子化处境。在此背景下,不少青年以“爹味”为喻,嘲讽并建议学者不要“随时随地好好为人爹”。

在青年中“出圈”的专家学者,则实践了一种“去权威化的权威构建”,他们在公众传播中的自我剖白极大地消解了学术权威常有的神秘感与距离感,为面向青年群体的真诚对话奠定了基础。这些“可对话权威”擅长实现单纯学术概念的“生活化转译”,由此与青年群体建立了深度连接。

比如,文艺理论专家汤拥华深入不少年轻

人迷惑的短剧世界,躬身入局并试图理解其中的情感机制与文化逻辑,展示了人文学者对青年文化消费习惯的尊重。

北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程乐松教授一个多月的开学致辞亦被网友称为“封神”,他坦诚地谈及焦虑、挫败和懊恼等情绪并赋予其以哲学意义上的合法性。这种平等共情让现场内外的青年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权威的温情化,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被看见”“被理解”和“被尊重”。

从青年心理机制和需求看认识何以形成

“可对话权威”作为一个群体的兴起,在于其高度契合了当代青年的心理机制和认同需求。

首先,是情感认同的建立。舍弃“我们当年如何”“现在的年轻人如何”的训诂话语,“可对话权威”从不对青年进行单纯道德评判,而是将其迷茫、焦虑等情感解读为一种结构性困境,因而能够引发青年的强烈共鸣。正如项飙主张“内卷不是你的错”,程乐松肯定“想不开”的价值,这些是对青年处境抱有深刻理解的“共情和同情”。

其次,是高阶知识价值的获得。“可对话权威”提供的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有专业思想支撑的、高阶的、可操作的方法论。比如,项飙建议青年通过“重建附近”来对抗主义贫困;汤拥华通过对短剧的分析,引导当下青年思考文化消费背后的机制……这些高阶的“思想工具箱”让青年获得了跳脱局限的思想支点。

再次,是身份认同的强化。“可对话权威”的对话方式和姿态让青年感受到了基于平等的被尊重和被理解,这种立场特别契合那些自认为处于主流边缘的青年群体的心理需求。

最后,是参与召唤中驱动积极心理与积极行动。从项飙对话体式的文本结构,到汤拥华、程乐松等基于青年文化语境的演讲,“可对话权威”的话语形式本身就在邀请青年参与进来,形成建设性的共同行动。这种尊重主体性的“共同参与行动”会带来积极心理与积极行动。

超越个案和现象:对青年工作与理论传播、思政话语的启示

“可对话权威”群体的出现,远远超出学者走红、网红变现的个案意义,它为如何有效构建与新时代青年的对话通道提供了不少启示。